

王廷相的“道真”观念与儒家道论传统的转型

胡栋材

(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南长沙, 410083)

摘要: 王廷相的“道真”观念富有道家思想意味, 这一观念集中体现了他对儒家之道的理解及其学说品格, 且蕴含“求道”与“求真”的思想张力。道真说显现出王廷相对儒家之道的理解具有独立、明辨和求真的现代性价值诉求, 体现出道的开放性、批判性和经世致用性等思想特质。这些思想特质对宋儒特别是朱熹所确立的道统说构成一定程度的批判, 理论上成为明清之际的反理学思潮以及清代中期“新道论”的思想前缘, 在儒家道论传统由“求道”向“求真”的转型中起到了促进作用。

关键词: 王廷相; “道真”; 道统; 真理观; 气论

中图分类号: B248.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17)04-0071-06

作为明代中期少数敢于正面批判程朱理学的儒者之一, 王廷相(1474—1544年)的思想以其气论学说最受注目, 学界相关研究也多集中于此^①。从思想发生的实际进程来看, 王廷相直到壮年才完成由“文士”向“儒士”的身份转换, 而其思想代表作《慎言》问世时他已54岁, 可谓大器晚成^②。王廷相的儒者身份是如何确立的, 其思想品格与学说脉络有何独特之处, 这些问题有待深入考察。本文试论明: 在王廷相思想形成过程中, “道真”观念构成重要线索之一, 这个富有道家思想意味的观念实际上体现了他对儒家真理观和价值观的独特理解, 同时构成其气论学说的内在动力; 不仅如此, “道真”观念还对程朱理学的道统观构成了一定程度的冲击, 对儒家道论传统在明清之际由“求道”向“求真”的转型有所推进。

一、“道真”观念的提出

基于对帝、王、孔子三个政教典范以及文明史分期与连续性的理解, 儒家的“道统”意识逐渐出现, 这种意识最早在《尚书·大禹谟》中通过“十六字心传”即“道心惟微, 人心惟危; 惟精惟一, 允执厥中”的方式得到集中呈现, 后来在《论语》以及《孟子》中得到接续性的表达和阐述。到了汉代, 儒学定于一尊, 后来随着道、佛的兴盛, “儒门淡薄, 收拾不作”

的境况使儒者深刻感受到护卫儒学的迫切性和重要性。韩愈在儒道佛三教并立的情况下辟佛老, 明仁义, 重新确立儒学的正统地位^[1]。他对儒家道统意识的阐扬, 对儒学的重振, 特别是对宋代理学的兴起产生了重要的积极影响。张载“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之说, 就极好地体现了儒者的卫道意识、担当意识和道统意识。

朱熹及其弟子对道统的论述和构建进一步修正并强化了前儒的“道统”意识, 自朱熹之后, “求道”成为儒学的根本大源问题, 相应地, 对道的体贴就成为儒者希贤希圣的不二法门^[2-3]。比如, 朱熹和吕祖谦将“道体”的论题置于《近思录》篇首, 他们的用意十分明显, 就是要让有志于道的儒者“足以得其门而入”^[4]。反而观之, “不见道”或“不知道”在儒家话语体系中便构成相当严厉的批评。陆九渊在鹅湖之会(南宋淳熙二年, 1175年)上指斥朱熹之学“易简工夫终久大, 支离事业竟浮沉”^[5], 某种意义上就是批评朱子之学“不见道”。成就圣贤之道是整个宋明儒学的主题之一, 相应地, 儒者对圣贤之道的不同理解就难免成为思想论争的焦点。道统说以及天理观就是宋以后儒者理解儒家之道的典型表达。

与那些自小就有志于圣贤学问、希圣希贤的儒者(如王守仁)相比, 王廷相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流连于诗文之学(世称明代“前七子”之一), 直到壮年, 经过不断反省和悔悟, 他终于立定为道之学的志向,

收稿日期: 2016-10-25; 修回日期: 2017-01-21

基金项目: 中央高校科研启动基金资助项目“王廷相气论思想研究”(502041003); 中南大学首批创新驱动项目“基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资源优化配置与综合创新研究”(2015CX011)

作者简介: 胡栋材(1987-), 男, 江西鄱阳人, 哲学博士, 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 明清儒学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从而转向儒家之道,明确其儒者身份。王廷相本人曾直言:“仆蚤岁问学,无所师承,亦随众致力词藻,侏侏贸贸于无益之途,极十余稔。及壮年以来,知自悔悟,回视少年,已自浪过者多,不可一二追复矣。至今恨然!大抵体道之学,缓急有用于世。诗文之学,君子固不可不务,要之辅世建绩寡矣,而不适用也。”^{[6](482)}王廷相深切意识到,“致力于诗赋”的行为并未使其人生价值与目标得到实现,对此他作出了深刻反思。要而言之,从对诗文之学的悔悟中自觉转向对儒家之道的追求,是王廷相提出“道真”观念的重要思想前提。

正是基于这种思想前提,王廷相提出了“道真”这一重要思想观念。他指出:“儒者之为学,归于明道而已。使论得乎道真,虽纬说稗官,亦可从信,况庄、列乎?使于道有背驰,虽程朱之论,亦可以正而救之。斯言也,何论道不广若是!”^{[6](597)}这段话出自《太极辩》,为王廷相在正德十三年至十六年之间(1518—1521年)的主要哲学创作之一,在这里,“明道”被他指认为儒者之学的旨归,只要是有利于阐明“道”的思想学说,都要加以肯定和吸收,不能惮于权威之论或束缚于门户之见。“明道”的终极目的必定是通达“道真”。“道真”不专属于儒家,更不囿于程朱理学所规定的科举条目。

在王廷相看来,真正的“道”是独立于儒家、道家等诸子百家的客观性存在,各家学说是否值得信从,就看它们得不得乎“道真”,这种看法有现代哲学真理符合论的意味^[7]。王廷相并没有将道的认识局限于儒家的视域之内,“道真”的思想观念揭示了真理在认识过程中具有独立性、客观性的特征。王廷相的这种道真说主要指向认识的真理性问题,后来他碰到认识的真理追求与价值性依归不一致的情况,为他思考道真说和道统说之间如何协调的问题埋下了伏笔。

从文献上看,王廷相选择“道真”这个富有道家色彩的概念来阐发他的儒家真理观,有可能受到了《云笈七签》“老君者,乃元气道真,造化之自然者也”^[8]等相关说法的影响,当然,这并不表明此概念就一定取自道家学说。在王廷相之前,西晋文学家潘尼在《释奠颂》一文中有“抽演微言,启发道真,探幽穷赜,温故知新”^[9]之语,在潘尼的论述中,“道真”相应于“微言”,其意思大概指儒家思想的“大义”。在参与明中期的文学复古运动之时,王廷相很可能就熟知了潘尼所说的“道真”,因此他在《太极辩》特地拎出这

个概念,并以之为思想核心,阐发自己对儒家之道的真理性认识。

从理论上讲,王廷相的“道真”观念似乎受到张载“太虚即气”说的启发。《太极辩》中的“道真”概念和《正蒙》中的“太虚”概念一样,都是借助道家的词汇来阐发儒家思想的。王廷相深谙张载之学,因此他在表述自己的独特思想见解时,有可能效仿张载及其“太虚即气”说^③,创造一些新的表达方式或着重阐述以往不被注意的语辞或概念,“道真”说就是如此,这在某种意义上显示了儒道思想的融合。

二、“道真”观念的思想品格

“道真”观念涉及两个关键性思想因素,一是儒家之道(“求道”),一是真理性认识(“求真”)。理论上讲,求道必定以求真为基础,求真以求道为依归,在儒家看来,二者是合一的,但在一定的思想环境中,求道的优先性与求真的原则性之间会产生不协调的问题。在王廷相这里,其道真说突出了道的三大思想品格,即开放性、批判性和经世致用性。他曾表示:“道犹海,会纳百川矣。圣如日,溥照万汇矣。执一德者途狭,睹一隅者行碍。兹谓大道之观已乎?”^{[6](453)}以会纳、会通百川之海来譬喻“道”,生动地说明王廷相所理解的“道”(包括儒家之道)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的特质。就此而论,“道真”作为关于道的真理性认识,就不是封闭性的一隅之思、一偏之见,也不一味排斥他者的意见。后来黄宗羲说“盖道非一家之私,圣贤之血路,散殊于百家,求之愈艰,则得之愈真”^[10],这种开放、包容的真理观与王廷相的“道真”观念是相通的。

“道真”观念的开放性并不意味着它不设门禁,所有学说均可任意出入。王廷相所说的“道真”是以“真”为第一要素的,这一点在他思想前期表现得非常明显。任四川提学时,王廷相曾对他的同僚彭杰说:“齐客有善为鸡鸣者,幽谷之鸡闻之皆鸣,不知其非真也。学者于道,不运在我心思之神以为抉择取舍之本,而惟先儒之言是信,其不为函关之鸡者几希矣!”^{[6](510)}王廷相讥讽“惟先儒之言是信”的行为,意在表明自己不是宋儒的应声虫,与此相应,他主张为学要运用自身的心思去辨认真正的儒家之道,这种态度包含一定范围内的批判精神或怀疑精神。

在王廷相看来,所谓儒道之“真”,在价值论层面,

指儒家的“明体适用”之道值得被追求、应该被接受，它更有益于生活以及人和社会的发展，“儒者之道，其要归之明体适用，而其极至于弥纶参赞之化而后已焉”^{[6](559)}；在认识论层面，它指儒家“六经”的认识都是真实不虚、见之于行的，“《六经》之所陈者，皆实行之著，无非道之所寓也……是故学于《六经》而能行之则为实，反而能言之则为华，斯于圣蕴几矣”^{[6](816)}。综而言之，对儒道之道的真理性认识最终要归结到“实”上面来。同样，作为一种理想信念的“道真”，既以对儒家之道的真理性认识为前提，还必须落实为具体实践活动。作为理想信念的“道真”必须落到实处，见用于世，才能体现其儒家之道的价值所在，这种思想倾向使得王廷相对儒家之道的理解特别强调经世致用的品格，明确批评那些流于虚荡的讲学之风。由此可见，道真说的确立不是说不需要道统观，而是通过道真说表达一种开放的、批判的道统观，而非定于一尊、排斥他者之见的道统观。

实际上，儒家经世致用的传统在王廷相身上有全方位的展现^[11]：在宇宙本体论方面，他主张“道体”是“本有本实”；在人性论方面，他肯定“人性之实”；在修养功夫论方面，他强调“从著实处养之”；在政治实践方面，他注意改革可行性与实效性的结合。并且，王廷相还将这种经世传统溯源于“六经”，意在强调儒学经世思想有其大本大源。比如其诗云：“六籍皇王术，诸生口耳为。好存经世业，留取后人师。”^{[6](228)}这种做法合乎有宋以来的儒家传统，“宋初三先生”之一的胡瑗即确立经义与治事为儒学主要内容，讲明“六经”与治民安世互为一体^[12]。不过这里需要点明的是，在遵从儒家经世传统的背景下，王廷相越来越突出“经”的正统作用。

嘉靖十七年(1538年)四月，65岁的王廷相在为《雅述》撰写的序文中说：“经者，常道也，可常以范世者也，故由之则治，迷之则危，去之则乱，确乎可守而不可畔也。然世逐风漓，异端窃起，而老、佛清静无为之论出，世乃为之大惑；由是百氏九流，纷坛杂还，各就所长，而《六经》中正淳雅之道荒矣……余不自量，每于读书之暇，其于天道人事，变化几宜，诸所拟议有不符于圣者，时置一论，以求合道真。”^{[6](831)}《雅述》的意图在于契合“六经”之道，这是对《慎言》所说的明道、征圣的主旨的加强。在王廷相看来，作为万世人道的衡准，“六经”之道只可信守、不能叛离，执此理念，“道真”观念当然就寓于“六经”之中，

后世儒者所要做的就是“信而守之”。

从《太极辩》开始，王廷相生命最后的二三十年的主要工作就是辨明儒家之道，以期通达于“道真”。目睹“六经”的中正淳雅之道被迷乱和荒废，他不得不投身于卫道的洪流之中。在此情形之下，佛道之学、九流百家之学统统被他列入黑名单，宋以来儒家内部人士更成为他批判的焦点。在王廷相看来，儒家之道主要是被后世儒者损坏的，也只有儒家内部人士才能真正损坏儒家之道。为此，他的“道真”观念越来越严格，越来越突出道统的优先性，以致他最终认定只有“六经”才能保证儒家之道的确定性和可靠性。如他所言：“言道而不本于‘六经’，九流将足以乱其真。”^{[6](399)}《杂怀五十首》的最后一首更说：“下士闇道真，犹为好辩讥。屹屹徒穷年，同心更尹谁？譬彼燎原火，盎水徒尔为。不惜复鬻鬻，愿俟后圣嗤。”^{[6](100)}王廷相将他对于宋以来儒者的批判看成是拨正儒家之道并使“道真”重得光明之举，他自觉与俗儒、下士等的好辩行为区隔开来。至此，批判庸俗之见、廓清儒家的本来面目已成为王廷相著书立说、论辩辩难的最主要任务。

从《太极辩》到《慎言》《雅述》，王廷相“道真”观念的演变显示出三个思想节点：其一，撰写《太极辩》之际，他认为关于道的真理性认识不必专属于儒家，即使异端邪说与“‘六经’仲尼之道”不同，也不能完全予以否弃，况且，异端之学中也有“道真”存在的可能性。其二，在《慎言》辑成时，他即明确指出：“斯道以之芜杂，其所由来渐矣。非异端能杂之，诸儒自杂之也。”^{[6](750)}此时王廷相仍未明确斥责异端之学，他甚至认为并非是佛道之学使儒家之道变得芜杂不堪，儒家之道被败坏的根本原因源自于儒家内部。其三，到《雅述》问世之日，佛道已被他明确视为异端之学以及“近世诸儒”的帮凶，“老、佛清静无为之论出，世乃为之大惑”，尤其是“自南宋以来，儒者议论，迁就时俗，采据异道，已与孔子之道多相背驰”^{[6](477)}。王廷相深信，只有在“六经”中求取“道真”，才能最大程度地避免有害于儒家之道的行为。至此，“道真”观念只能退缩到“六经”的堡垒中去。随之而来，“宗经”成为他关于儒家之道的真理性认识的唯一可靠来源。

“道真”观念之所以会在王廷相这里获得重要思想内涵和意义，就在于它被赋予了融合“求道”与“求真”的思想意图，在其不同时期的思想中，真理性原

则和价值性依归先后得到了强调。实际上,从“求真”的意义上来说,“道真”并不限于儒家;但从“求道”的意义上来看,“道真”必定指向儒家之道。这就在儒家之道与真理性认识之间构成了一定思想张力。在“道真”观念提出之初,这一思想张力在王廷相思想中尚处于潜存状态,他最终将“道真”归置于“宗经”,就是为了消除“求道”与“求真”的不协调问题。“宗经”对“求道”与“求真”的统摄,表明王廷相并没有从根本上违逆儒家道论传统的逻辑,即以道德价值为优位。

三、“道真”观念与儒家道论传统的转型

宋代儒学演变为道学或理学,某种意义上就在于它对儒家道统意识的进一步强化,即在儒学内部确立道学或理学的正统地位^[13]。对宋明理学而言,从外部来说,道统说是对佛老的拒斥和批判;从内部来说,道统说促成了儒家学说自身的学派划分和谱系生成。从朱熹到现代新儒家,儒者对道统说之所以念兹在兹,乃因为这一论题涉及儒家之道的根本。“求道”历来是儒者思想的主旨,“六经”作为儒家之道的重要载体和根本体现,自然是儒者“求道”必须面对的终极存在。在疑经思潮盛行的时代条件下,王廷相能够突出“经”的权威性,倡导以一种较为理性的知识论态度来研读经典,这是难能可贵的。更重要的是,他一度还以“求真”为首务,这对于儒家传统价值观特别是道论传统的转变和更新有积极作用。

从更广阔的思想史视野来看,由“求道”向“求真”的思维方式的转变是中国传统价值观向近现代价值观转变的典型表现之一。先秦、汉唐以来的中国哲学形上学,主要表现为以“求道”为主的思想特征,这一思想特征经过宋儒特别是朱熹及其门人的重整,使儒学的“求道”精神集中表现为价值论意味浓重的道统论。从理学自身的多维发展以及明清之际反理学思潮的兴起,儒家思想传统整体上表现为从以“求道”为主流倾向的哲学形上学方式向“求真”的思维方式的过渡,以至清代中期乾嘉学者普遍提出一种新“道论”,即在“求真”“求是”中“求道”。比如思想成熟时期的戴震,讨论具体的天道和入道,而拒斥理学传统的道论^[14]。章学诚以“三人居室而成道”的观念阐发了一种“百姓日用而不知”的人道观,凌廷堪、焦

循、阮元等的道论,则已经基本失去形上学的意味。他们普遍倾向于在“求真”“求是”中“求道”^[15]。正是在这一转变的历程中间,王廷相的“道真”观念倾向于使宋儒高悬的“道统”观或“天理”观落实为具体的真理性认识活动,这对宋儒道论传统由先验性品格、思辨性品格向实践性品格的转变起到了促进作用。遗憾的是,他的这一做法并没有贯彻到底。

如果说宋明理学以气本论、理本论、心本论为其中最为突出的三派思想体系,那么,清代乾嘉学术时期的哲学形上学追求则以“道本论”为其典型形态。实质上,道论是儒家学术思想的核心要素之一,从先秦儒家以来,儒家就在百家争鸣的过程中形成了深厚的道论传统。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儒家自身的演变,道统观从儒家道论传统中突显和不断分化,成为儒家面对和解决时代问题以及调整自身发展的内在理论动力。在道论的范围内,道统观主要指向儒家学术价值理念的依归问题,而王廷相的道真说的本意在于阐发学术认识的真理性来源与检验问题。以戴震为代表的清代儒者,一反程朱理学的传统,为儒家的道论传统注入经验论和实证化的因素,力图使儒家的知识与价值突破理学道论传统的束缚,说明和解决新的时代问题。

既要坚持开放、批判的为学之道,又要宗于儒家经典之教并使之切于日用平常,这导致王廷相必须面对一个尖锐的问题,那就是信守“六经”(“求道”)与“脱去载籍,任吾心灵”(“求真”)之间如何能协调一致。由于贯彻了经世致用的儒家传统伦理精神,“道真”观念已经不可能仅仅是知识论意义上的“求真”,它必然内含价值论意义上的“求道”。更准确地说,“求真”必定让位于“求道”,而“道”则只能寓于“六经”之中。因此,“求道”的行为就落实于对“六经”的研读和体认之中。特别是面对僵化的程朱理学以及倡导讲学之风的阳明学,王廷相指出“宗经”是儒家之道得以实现的唯一途径,这有其时代意义^[16]。在此情况之下,“道真”观念一步步演变为对“六经”孔子的复归,“六经”孔子之教成为一切学说的通行标尺,以致王廷相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明清时代儒者反对理学并试图“以复古求解放”的思想先驱之一。

儒学发展至宋明理学阶段,“道统”意识比较凸显,正是在强烈的“道统”意识的作用下,宋明儒学普遍关注的是道德伦理领域的“真”,对于知识论意义上的“真”关注不多。即使到了明清之际,“求真”的价值

理想仍然并非主要表现在对自然界真知的探求，而是发端于对人的真实本性的追求(比如李贽的“童心”说)^[17]。王廷相的“道真”观念无疑也是一种“求真”价值理想的表现，不过它在提出时并未以先验的道德理念或天理观念来统摄“求真”的行为，而是在批判正统化理学的实践中强调儒家之道的开放性、批判性和经世致用性，这对当时“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的思想局面起到了一定的解放作用。

即使如此，王廷相的“道真”观念仍然无法摆脱“求道”与“求真”之间所构成的内在思想张力，这导致它最终不得不走向“宗经”的道路，即“道真”必定归属于“六经”。以是之故，“道真”观念无法从根本上突破以伦理为优先的理学正统，它在“求真”方面的思想作为无论在深度还是广度上都不足以使儒学开出新的格局，就此而言，王廷相的道真说不及王守仁的良知学说。

但无论如何要肯认的是，王廷相的“道真”观念所代表的真理观显然比韩愈以降的儒家“道统”观更符合现代知识论、价值观的特质与追求，而且它在破除程朱理学的道统观和天理观对儒学的束缚方面提供了积极作用。“道真”观念为我们深入揭示王廷相及其气论学说的内在动力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线索^[18]，更为重要的是，它构成了宋明理学的道统说和明清之际由“求道”向“求真”的新道论之间的桥梁。我们不能过分抬高王廷相“道真”观念给儒家道论传统的转型造成的积极作用，毕竟从思想的实际情形来看，他受缚于正统化的理学意识形态，并没有自觉地促进儒家道论由“求道”到“求真”的转型，更没有意识到这一转型道路的坎坷和艰巨。然而，在儒家传统价值观由“求道”到“求真”的转变过程中，“道真”观念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注释：

- ① 详细观点请参见：葛荣晋的《王廷相和明代气学》，中华书局1990年版；高令印与乐爱国的《王廷相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王俊彦的《王廷相与明代气学》，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版；王论跃的《关于王廷相研究的几个问题》，<http://www.Confucius2000.com/admin/list.asp?id=1766>。
- ② 对于明代“前七子”之一的王廷相在文学复古运动后期由文人转向儒者的情况，有论者总结为“弃文从道”，有论者则认为是在理学思潮影响下的“思想转换”，还有论者指出这实际上是一种“儒士化”的现象。这些观察都有一定见地，但还不够

深入，特别是对“儒者王廷相何以可能”这个问题，缺乏详细的、有说服力的考察。

- ③ 张载十分重视语词(概念)的使用和创造，他在《理学经窟》等文本中说：“学者潜心略有得，即且志之纸笔，以其易忘，失其良心。若所得是，充大之以养其心，立数千题，旋注释，常改之，改得一字即是进得一字。始作文字，须当多其词以包罗意思。”他还说：“某比所思虑事渐不可易动，岁年间只得变得些文字，亦未可谓辞有巧拙，其实是有过。若果实达者，其言自然别，宽而约，没病痛。有不是，到了是不知。知一物则说得仔细必实。”

参考文献：

- [1] 梁涛. 回到“子思”去——儒家道统论的检讨与重构[J]. 学术月刊, 2009(2): 54-62.
- [2] 彭永捷. 论儒家道统及宋代理学的道统之争[J]. 文史哲, 2001(2): 36-42.
- [3] 苏费翔. 宋人道统论——以朱熹为中心[J].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1): 17-24.
- [4] 陈荣捷. 近思录详注集评[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328.
- [5] 陆九渊. 陆九渊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301.
- [6] 王廷相. 王廷相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9.
- [7] 曾志. 真理符合论的历史与理论[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0(6): 53-61.
- [8] 张君房. 云笈七签[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3: 2205.
- [9] 房玄龄, 等. 晋书·第五册[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1511.
- [10] 黄宗羲. 黄梨洲文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9: 160.
- [11] 冯天瑜. 试论儒学的经世传统[J]. 孔子研究, 1986(3): 27-36.
- [12] 朱熹. 朱子全书·第12册[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10: 318.
- [13] 土田健次郎. 道学的形成[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455-456.
- [14] 戴震. 孟子字义疏证[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21-25, 43-47.
- [15] 吴根友. 比较哲学视野里的中国哲学[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242-269.
- [16] 蔡方鹿. 王廷相寓道于“六经”的思想[J]. 现代哲学, 2008(6): 111-116.
- [17] 萧蓬父, 许苏民. 明清启蒙学术流变[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3: 5-15.
- [18] 胡栋材. 试论王廷相的“气种说”[J]. 中州学刊, 2013(4): 109-113.

Wang Ting-xiang's concept of Dao Zhe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tradition of Taoist theory of Confucianism

HU Dongcai

(School of Marxism,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Abstract: Wang Ting-xiang's concept of Dao Zhen, rich in Taoist thoughts, embodies not only Wang's understanding of Confucianism and the character of his doctrines, but also his ideological tension between seeking Tao and seeking Truth. His theory of Dao Zhen reflects that his understanding of Confucianism shows both modern appeals of independence, discrimination and truth-seeking, and characters of openness, criticism, statecraft of Dao in Confucianism. These characters, to a certain extent, criticized ZhuXi's Taoist orthodoxy, and, theoretically, became the trend of the anti-Neo-Confucian at the turn of Ming and Qing as well as the leading edge of thought of new theory of Tao in the mid-Qing Dynasty. Hence, the concept promot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tradition of Taoist theory of Confucianism from seeking Tao to seeking truth.

Key Words: Wang Ting-xiang; DaoZhen; the Confucian Orthodoxy; view of truth; the theory of Qi

[编辑: 颜关明]

(上接第 63 页)

Digestion or reconstruction: On the evolution of the fate of metaphysics in modern Chinese philosophy

HAN Likun

(School of Marxism, Shenyang University, Shenyang 110044, China)

Abstract: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philosophy, which is manifested as the reconstruction of metaphysics, has been confirmed in "the philosophy history of writing". The theoretical premise of the reconstruction is the legitimacy of metaphysics in Chinese philosophy. Objectively, a series of discussions about this issue constitute the metaphysics trend of thought in modern philosophy. In the face of rejection, the metaphysics in Chinese philosophy has not been digested or degraded, but instead, it has become the main content of "the philosophy history of writing" as the conceptual premise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philosophy, and has effectually promoted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Therefore, it is vital to sort out the complicated destiny of metaphysics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philosophy, to grasp exactly the modern evolution of metaphysical ideas, and to reveal the great significance of the reconstruction of modern metaphysics, so as to correctly examine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Chinese philosophy history and its modern development.

Key Words: metaphysics; science; ontology; value history

[编辑: 颜关明]